

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李逸友 魏堅 主編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第一辑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李逸友 魏 坚 主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7 号

496.00.00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 蒙 古 文 物 考 古 文 集

编 者：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翟德芳

封面设计：童行佩

技术设计：张新民

出版发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编 100037)

排 版：北京市久久文化公司

印 刷：北京宏伟胶印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44.5

字 数：1115 千字

版 次：199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70

书 号：ISBN7—5000—5436—X/K·166

定 价：40.00 元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

四十周年纪念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是一部举世无双的巨著，常学常新，永无止境。当代中国考古学的一大成果是，读通了她的连绵不断、波浪式前进的包涵着发展阶段的立体交叉、多次重复的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与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北方、中原、北方草原贯彻始终。这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依托。

两千年前秦朝完成的一统实体，实质上是夏商周三代之末战国七雄的统一。中华古史前期遗留下来的摆在日程上的大课题是用长城形式把北方草原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隔离开的对立格局。

秦统一是中国古史一大转折点，在这之前已经历过两大段落，其一是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模式、最早的古国（六千年前），体现了北方与中原之间民族文化的组合与重组；其二是以“后仰韶”诸文化以及夏商周三代为代表的中原模式、较早的古国（四五千年前），体现了以中原为中心的西北与东南诸民族文化的组合与重组。在它之后经历的是秦汉帝国解体后一、二千年间，以源于北方草原的几个朝代（鲜卑北朝、契丹辽、蒙古元、满洲清）为代表的北方草原模式。蒙元、满清的开国史最具典型意义，没有这两者便没有今天的蒙、满两族，便难于理解我国今天民族自治区的伟大现实意义，更难于理解延续几千年的长城，经历过一、二千年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竟奇迹般地被清朝开国百十年间营建的承德避暑山庄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建筑群取而代之了！如果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传统还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课题，前边列举的中国古史发展模式的三类型，特别是最后一二千年间的史实，应对我们理解“古”与“今”的接轨有所启发。

苏秉琦

1994.2.7日

序 言

1994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40周年。我谨代表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向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及全区的文博战士表示热烈的祝贺！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是建国后我区组建的第一个文博单位，成立于1954年之春，当时称“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组”，仅5名专业干部，是个半行政半业务单位，从事全区范围内的文物政策宣传、调查清理和文物保护工作，这是我区文博事业的开端，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在文物工作组大量艰苦工作的基础上，1957年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1958年成立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1959年成立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六十年代初在部分旗县设置专职文物工作干部。文物工作组也于1961年改建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成为调查、发掘、研究和保护文物的专门事业单位，由5人发展成10余人的专业队伍，继续在全区范围内深入开展工作，并取得一些重要成果，在区内外文物考古界享有一定声誉。十年浩劫，我区文博工作遭受重大损失，但文物考古工作者仍在逆境中顽强拼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迎来了文物考古工作的第二个春天，我区的文博事业飞速发展。1986年，文物工作队正式更名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全区的12个盟市和近一半以上的旗县也都相继成立了文物事业单位，到1993年底，全区文博职工发展到二千余人，考古研究所的专业干部也发展到近60人，成为全区文物考古工作的中坚和强有力的指导中心，而且发掘和研究成果斐然，受到国内外考古学界的普遍关注和高度评价。

40年来，文物组——文物队——文物考古研究所，为我区文博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简而言之，可概括为三大功绩。一是培养了我区的文博队伍。40年来，举办了数十期各类文物学习班，我区各盟旗的文物工作业务骨干，多数曾受该所业务人员的培训，掌握了文物考古工作的基本知识，发展了本地的文物工作。一花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这全区的满园之春，凝聚着考古研究所老一代专家和中青年一代专家的心血与汗水。二是有力地保护了我区文物古迹。在新老专家们长期艰苦工作的基础上，搞清了我区文物古迹留存的基本情况，于1964年公布了第一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公布了第二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40年中，进行了数以千次的文物抢救清理和考古调查，组织实施了像丰州辽塔、清将军衙署这样大规模的古建筑维修，特别是从业务上指导了历时八年的全区文物普查工作，发现不可移动的文物古迹点15000余处，为更长远的保护和利用奠定了基础，也为在国内树立我区边疆文物大省区地

位作出了应有的努力。留存既往，启发后来，保护祖先遗迹，功在千秋后代。三是取得了一大批考古发掘和科研成果。40年来，从事了辽代中京城、黑城古城、和林格尔汉墓、老虎山遗址、庙子沟遗址、白音长汗遗址、辽代陈国公主墓、辽代耶律羽之墓等一系列重要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陈国公主墓列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十年重大考古发现之一，耶律羽之墓被列为1992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震动了中国考古界。40年中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出版了数十种书刊、文集、专著，特别是《和林格尔汉墓壁画》、《阴山岩画》、《鄂尔多斯青铜器》、《黑城出土文书》、《辽陈国公主墓》等几部专著，受到了中国考古界的高度评价。经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基本上搞清了我区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到明清为止的文物面貌，特别是历代北方民族的历史文物面貌，从文物考古学上论证了中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其意义之大，自不待言。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工作大踏步前进，事业迅速发展，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的支持、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为此提供了极好的客观环境；考古所老新几代专家，辛勤的努力，忘我的奋斗，孜孜不倦的追求为动力，则是更重要的主观因素。40年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基本上形成了两大作风，即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严谨治学、勇于创新的作风。内蒙古大部分地区自然条件甚为恶劣，田野考古工作是件艰苦的工作，在交通不便和供应甚差的条件下，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便成为家常便饭。内蒙古的文物工作者是极端辛苦的，他们背着行李、赶着毛驴或骑自行车，进行过数百里甚至千里路程的考古调查；他们冒着严寒酷暑，迎着狂风流沙的袭击，奋战在沙海和戈壁滩上；他们千里护送文物，为保卫文物而连续多日目不交睫。老一辈文物考古工作者吃苦耐劳的作风，影响和带动了中青年一代，形成了该所的优良传统。文物考古研究是科学性强、难度很大的工作。内蒙古地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既少又晚，地下出土大量文物标本往往属于史前史或很少有文字记载的少数民族史，从无字处读书，在迷宫中辨证，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见。人们不会忘记寒夜孤灯下的呵笔疾书；更不会忘记盛夏烈日下的挥汗如雨。正是以这样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他们经过缜密的考证，推导出崭新的论点，从而基本上建立起内蒙古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框架结构。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坚持了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克己奉公，不谋私利，个人不收藏文物，具有高度的事业心，使内蒙古文物考古饮誉中华，为新中国文物考古事业写下了重要篇章。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为纪念成立40周年，邀请区内外的老、中、青科研人员，撰写了与内蒙古地区文物考古相关的学术论文，汇集编印《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以集中展示40年来内蒙古地区文物考古学术成就，特别是新的考古发现和科研成果。此举深受区内外考古学界同仁们欢迎，我国著名考

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特为此题辞祝贺与鼓励，国内一些知名学者撰写了论文。承蒙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同志、老专家和老朋友嘱托，写下上述文字，以此为贺！

感谢同志们 40 年的辛勤劳动！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贡献！！党和人民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 赵芳志
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博物馆学会理事长

一九九四年三月三十日

前 言

内蒙古地区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地上地下保存着极其丰富的文物古迹，新中国建立以来，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内蒙古文物考古的成就，是在区内外文物考古单位共同协作与支持下取得的，其中包含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考古室、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昭乌达蒙族师专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所等科研单位，文化系统所属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文物总店，各盟市文博单位（博物馆、文物管理处〔站〕、文物工作站）、各旗县文博单位（博物馆、文物管理所）等部门众多业务人员的辛勤劳动；由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划有过多变动，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宁夏、甘肃等省区的文物考古单位，都曾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开展过文物考古工作，因而有许多重要发现和科研成果，是区外各兄弟单位业务人员的劳动收获。内蒙古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和文化行政部门领导的重视和关怀，并得到了国内许多著名专家学者的教诲和指导，还曾就一些学术问题与海外有关单位和学者进行了交流。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创建于1954年春，至今已进入“而立”之年。回顾40年的风雨历程，道路崎岖而曲折，前进的路上并非一帆风顺，历经坎坷和艰辛。在研究所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上，虽具有一定规模和业绩，但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有待于今后不断改进和提高。仅就组织业务人员整理田野考古资料，编写文物考古报告和论著而言，虽已发表了不少报导、简报、报告、论文和几部专著，但还有甚多调查、发掘资料亟待整理和编写报告，若干科研成果等待刊印。首先，近年来配合基本建设工程而进行的考古调查发掘项目，每年多达数十处，其中有不少在学术上具有一定价值；同时在抢救性清理已被破坏的古遗址和古墓葬中，都有一些重要文物发现。这些文物考古资料内容相当丰富，涉及范围广泛，但尚不足以单独编为专刊或不适宜于在全国性专业刊物上发表。其次，历年的田野考古资料较多，其中有些甚至是五十年代积累的调查发掘资料。虽积压时间过久，不便以专刊或专著形式发表，但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再次，科研新成果不断涌现，专业人员逐年增多，且业务素质陆续提高，科研成果成倍增加，近年来编撰出不少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论文。全区文博工作单位亦都存在有与此相同的情况。为此，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决定将这些资料和论文，陆续结集出版，定名为《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以弥补过去的不足；并在纪念本所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先行编辑出版第一辑。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的编辑宗旨，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报导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的学术成果，探讨与内蒙古文物考古相关的学术课题，交流业务工作经验。为此，本文集收录文章的著者范围，不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人员为限；凡区内、区外的专业文物考古科研人员或业余爱好者，编撰有关内蒙古文物考古方面的报告或论文，均为本文集收录范围。欢迎海外对内蒙古文物考古有兴趣的专家、学者们为本文集惠赐文稿，如有海外已经发表过的这方面论著，本文集当尽力翻译予以转载，并望各方面予以推荐。

编 者

一九九四年二月

目 录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纪念	苏秉琦	(1)
序 言	赵芳志	(1)
前 言		(1)
论内蒙古文物考古	李逸友	(1)
华北古代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与发展	郑绍宗	(41)
中国岩画学研究述评	盖山林	(54)
扎赉诺尔蘑菇山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汪宇平	(62)
巴林右旗床金沟发现一处岩画	吉 平	(72)
人面纹石斧、人面纹石铲的神话学考察——兼论匈奴“龙祠”祭典的神话学传统	陆思贤	(74)
乌尔吉木伦河流域的三种史前文化	徐光冀	(83)
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发掘简报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87)
巴林左旗友好村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96)
富河文化的若干问题	朱延平	(114)
大沁他拉陶器再认识	朱永刚 王立新	(119)
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魏 坚 崔 璇	(125)
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时代早、中期遗存述论	崔 璇	(144)
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居址建筑	杨 杰	(152)
狼窝沟遗址孢粉分析反映的古植被与古气候	郭殿勇 李晓滨	(163)
准格尔旗周家壕遗址仰韶晚期遗存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167)
准格尔旗寨子上遗址发掘简报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174)
准格尔旗白草塔遗址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183)
准格尔旗南壕遗址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205)
准格尔旗小沙湾遗址及石棺墓地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225)
准格尔旗永兴店遗址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235)
准格尔旗二里半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246)
准格尔旗高家坪遗址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	(261)
准格尔旗小庙遗址发掘简报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272)
赤峰地区早期冶铜考古随想	郭大顺	(278)

晋陕高原及关中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结构分析	张忠培 朱延平 乔梁	(283)
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几个年代问题	林沄	(291)
试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	翟德芳	(296)
夏家店上层文化空首青铜斧及相关问题	齐晓光	(317)
论古代战车及其相关问题	乌恩	(327)
从军都山东周墓谈山戎、胡、东胡的考古学文化归属	韩嘉谷	(336)
托克托城附近的秦汉代遗迹	李逸友	(348)
呼和浩特市郊区二十家子汉代城址出土的封泥	张郁 陆思贤	(354)
从一类发现谈一个认识问题	刘观民	(365)
扎赉诺尔古墓群 1986 年清理发掘报告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369)
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鲜卑墓群发掘简报 ...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额尔古纳右旗文物管理所		(384)
科右中旗北玛尼吐鲜卑墓群	钱玉成 孟建仁	(397)
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	乌兰察布博物馆	(407)
察右前旗下黑沟鲜卑墓及其文化性质初论	郭治中 魏坚	(434)
武川县二份子北魏古城调查记	乌兰察布博物馆	(438)
唐拂云祠地望考辨	刘幻真	(443)
阿巴嘎旗巴彦图嘎石人、石堆墓	丁学芸	(446)
巴林右旗塔布敖包石砌墓及相关问题	齐晓光	(454)
契丹头衣考略	田广林	(462)
黑山辽碑发现记略	韩仁信	(470)
辽代庆州白塔建塔碑铭考	张汉君	(475)
辽陈国公主墓出土伊斯兰鍍花铜盆考	马文宽	(486)
辽陈国公主墓志考释	张郁	(489)
辽代契丹族金属面具、网络等葬俗的分析	侯峰	(504)
辽上京城址勘查报告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510)
巴林右旗敖包恩格尔辽墓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537)
突泉县西山村辽墓	孟建仁 钱玉成	(542)
宁城县岳家仗子辽萧府君墓清理记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	(548)
和林格尔县前瓦窑沟辽、金时代遗址	乌兰察布博物馆	(553)
百眼窑石窟的营建年代及壁画主要内容初论——兼述成吉思汗在 百眼窑地区之活动	王大方 巴图吉日嘎拉 张文芳	(566)
准格尔旗周家壕与马家圪旦西夏元代遗址发掘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579)
察右后旗石门口金代遗址发掘简报	乌兰察布博物馆	(585)
巴林右旗辉腾高勒金代窖藏铜钱相关问题	苗润华	(591)
东夏“胡迪谋克之印”考释	钱玉成	(596)

论呼伦贝尔发现的室韦遗迹	赵 越 (598)
额尔古纳右旗奇乾乡文物普查简报	
...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额尔古纳右旗文物管理所 (601)	
镶黄旗乌兰沟出土一批蒙元时期金器	内蒙古博物馆、锡林郭勒盟文物管理站 (605)
正蓝旗羊群庙元代祭祀遗址及墓葬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正蓝旗文物管理所 (610)
正蓝旗羊群庙石雕像研究	魏 坚 陈永志 (622)
科左中旗腰伯吐元代古城调查记	郝维彬 (630)
丰镇市八号地元代遗址发掘简报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636)
元上都城南砧子山南区墓葬发掘报告	
.....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锡林郭勒盟文物管理站、多伦县文物管理所 (639)	
赤峰市出土的也里可温瓷质碑	张松柏 任学军 (672)
阿鲁科尔沁旗白城明代遗迹调查报告	张松柏 (677)
科左后旗衙门营子出土的清代文物	于宝东 武雅琴 (689)
后 记	(697)

论内蒙古文物考古

李逸友

一 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伟大祖国的北部边疆，土地面积辽阔，呈东北向西南斜伸的狭长形，总面积约 118.3 万平方公里。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演化过程中，内外应力所塑造的自然面貌相当复杂，有高原、山地、平川、盆地、火山、熔岩台地和沙漠戈壁，其中海拔 1000 米以上的高原约占总面积的二分之一；水湿条件自东向西递减，热量则由东北向西南递增。各地自然地理环境的显著差异，直接制约着人类的生存条件和农牧业生产活动；而只有在气候条件较好的平原、丘陵山区、盆地等有着丰富水源的地方，才适宜于人类的生息。

早在远古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内蒙古境内已有人类活动。现已为国内外考古学界所承认的呼和浩特市郊大窑村石器制造场，距今已有约 50 万年之久。在内蒙古中南部和东部广大地区，先后发现多种古代文化及类型。这里是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两大区域之一，是史前时期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活动地带。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起，内蒙古地区曾经居住过许多少数民族，主要有山戎、北狄、林胡、楼烦、匈奴、东胡、鲜卑、乌桓、突厥、柔然、回鹘、契丹、室韦、库莫奚、靺鞨、女真、党项、蒙古、回回和满族等等，其中起源于蒙古高原，崛起于我国北方，并进入内地建立起国家政权的有匈奴、鲜卑、契丹、蒙古等族，在中国历史上曾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原住在南面内地的汉族（华夏人），从战国时期起多次大规模北徙到今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唐、明各代，都曾在今内蒙古地区建郡设治。古代北方各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经济文化各方面交往频繁，各自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共同谱写了中国历史的篇章。

考古学是根据过去人类遗留的物质资料，研究人类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内蒙古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是新中国建立后才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所获取得的大量实物资料，不仅是研究本地区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重要依据，亦是研究我国北方以及全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依据；已发现的许多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构成了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时期的匈奴、鲜卑、契丹等民族的考古学研究，已逐渐发展趋于成熟，已经或即将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内蒙古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内蒙古考古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在研究人类及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及其规律上，有着创史、补史和证史的重要作用。在创史上所起的作用至少有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是远古人类的创世史方面。远古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创造了人类本身。呼和浩特市郊区大窑村旧石器打制场发现了 50 万年前的遗存，当时人类本身还处于猿人阶段，而这处石器打制场一直沿用到距今 1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上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从这个地点可看出远古人类进化的过程。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开创了社会。第二是内蒙古以及北方地区的史前史研究方面，通过全面普查和重点发掘，确认了从旧石器时代经新石器时代，以至青铜器时代的一系列考古学文化，有大窑文化、河套人文化、扎赉诺尔人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

文化、红山文化、赵宝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庙子沟文化、阿善文化、朱开沟文化、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等等，这些可统称为原始文化的各种考古学文化，对于研究我国的史前史都有重要作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中原地区约自公元前 21 世纪的夏代以前算起，而内蒙古地区的夏、商、西周时代以及春秋时期，都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因而内蒙古地区的史前时期的下限，应推延至战国时期，也就是公元前 475 年前后。迄今为止在内蒙古境内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已可为史前时期的历史排出一个比较可靠时代顺序，从而为研究内蒙古地区的史前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第三是我国北方民族史研究方面。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开始，内蒙古地区为多民族长期活动的地方，其中匈奴、鲜卑、契丹、蒙古等族都是从这里兴起和发展的，研究其族源及其发展历程，仅凭少量的文字记载是远远不够的，而更为详尽的史料，却依赖于考古资料的获取。目前这些民族的考古学研究已有了很大的进展，正逐步向建立一个考古学分支学科方面发展，如嘎仙洞摩崖石刻的发现，不仅印证了北魏时期的鲜卑遗迹，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将鲜卑考古推前若干世纪的可靠地点，今后通过深入发掘和研究，必将对鲜卑早期的文化有更详细的了解，从而有助于鲜卑史研究的深入。

内蒙古考古所取得的资料，在补史和证史方面，既有补充文字记载的缺漏，也有订正文字记载的谬误；既有北方各民族的历史，又有汉族的历史；既有本地区的历史，又有全国的历史。其中大量历史文物牵涉面广，沿续时间长，能起到这两方面的作用。

内蒙古考古所获取的实物资料，又是研究人类社会创造各种物质文明史的重要依据，其中包括有建筑、青铜器、碑刻、简牍、货币、玺印、岩画、绘画、雕塑、陶瓷、纺织、印刷、书法、文化用品以及各种工艺美术等多种领域。内蒙古考古获取的实物资料，又为研究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精神文明提供了重要依据，其中既包括文字、音乐、舞蹈、戏剧、体育、杂技等文化方面，又包括原始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信仰方面。这些属于精神文明范畴的实物资料，既有民族的传统文 化，又有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化而创造出的新文化；既有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的，又有北方地区或内蒙古某些局部地区传播的；既有我国各民族传统的，又有从国外传播来的，而且其中某些外来文化已经中国化，甚至于地方化。这些对于研究我国各民族的传统文 化、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以及中国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等等方面，都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内蒙古地区获取的大量考古资料中，有许多是属于古代科学技术方面的，包括有冶金、纺织、农业、建筑、天文、地理、数学、化学、物理、机械、造纸、印刷、医药等等，不仅可以研究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更重要的是，应利用这些宝贵资料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近年来新兴起几门科技考古，都采用了内蒙古地区的考古资料，其中有沙漠考古、农业考古、地震考古等多种分支学科。如对于内蒙古境内各个沙漠和沙地的科学考察中，就成功地运用了沙漠考古资料，在了解历史上沙漠变迁规律的基础上，规划防沙和治沙，很有现实意义。在其他各种科技考古中，运用内蒙古地区考古资料的情况更多，兹不赘举。

文物考古工作所取得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是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and 民族团结教育的好教材。它是 以实物为依据，易于为人民群众所接受，有着不可估量的感染力，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而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见证，不仅反映了一个民族本身的传统文化，往往同时也反映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这些实物资料，形象生动地反映出有史以来内蒙古地区各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各民族间的互相依赖、互相支援、互相交流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也是我国民族团结政策的历史必然。因此，内蒙古的文物考古工作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过程

内蒙古地区的许多珍贵文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曾多次遭到外国人的盗掘和掠夺，只有少数爱国学者到边疆地区进行过考古调查发掘。内蒙古自治区的文物考古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各族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和创建了新中国以后，才逐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因此，内蒙古的文物考古分为新中国建立前后两大阶段，建国以前可分为外国人和我国学者两个部分；建国以后则可分为“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后两期，或者可称为内蒙古文物考古事业的肇创期和发展期。

1. 近代外国人在内蒙古的探险考察

鸦片战争砸开了封闭已久的中国大门，外国侵略势力便肆无忌惮地到处掠夺和盗窃我国珍贵文物。许多外国人打着旅行家、探险家或学者的旗号，公然在内蒙古境内活动；有些考古学者混杂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我国本国的侵略政策效劳；内蒙古地区的许多珍贵文物，还通过军阀、政客、商贾之手，辗转运出国外。从下面的一些外国人在内蒙古的探险和考察活动的简要叙述中，就可看到其中一些盗劫活动是多么触目惊心！

俄国早自 17 世纪就开始了对我国考察和研究，1858 年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后的 50 年里，来到中国的“旅行家”、“考察队”竟有三四十支之多，其中 1876 年、1887 年和 1889 年每年竟有四五支“考察队”在我国的蒙古、青海、新疆、西藏等地活动，盗劫珍贵文物便是他们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1892 年，俄国外交部奉沙皇之命，派遣一个蒙古学者波兹德涅耶夫 (А·М·Лозднеевым) 来到我国蒙古地区，调查蒙古的行政制度和现状。他在中国的 15 个月期间，曾到过张家口、北京、归化城 (呼和浩特)、承德、多伦诺尔、克什克腾、巴林旗、乌珠穆沁旗等地，调查过元上都遗址、元应昌路遗址、辽庆州遗址、辽金元丰州遗址等多处古迹，带走汉、蒙、满文的手抄本和刊印本历史文献 130 部，计 720 册之多，著有《蒙古及蒙古人》一书^[1]。俄人科兹洛夫 (Л·К·Козлов) 早在 1899 年就开始在我国西藏、青海和蒙古等地进行“考察”活动，1908 年终于弄清了额济纳旗哈拉浩特 (黑城) 的方位，在 1908 年和 1909 年两次大规模盗掘了黑城，盗走西夏文和汉文文书 2000 余卷，绢画 (唐卡) 300 余幅，以及一大批文物。1926 年他在今蒙古国的诺颜乌拉挖掘匈奴墓之后，最后一次扫荡了哈拉浩特。他在《蒙古·青海和哈拉浩特遗址》^[2]一书中，宣扬过他盗掘哈拉浩特的经过。此外，苏俄人于 1922 年在哈尔滨市建立过东北省文物研究会，在我国东北三省调查发掘古文化遗址，并曾到内蒙古呼伦贝尔一带活动，曾发表有《海拉尔附近新石器时代遗址》、《满洲最初发现之旧石器时代文化》^[3]等文章。

英国籍匈牙利人斯坦因 (M·Aurel Stein) 于 1901 年开始在我国西藏、新疆和甘肃一带进行“探险”活动。1914 年，他窜到了额济纳旗哈拉浩特，继科兹洛夫之后又一次盗掘了该城，将获取的西夏文和汉文文书运回英国。他将这段经历洋洋得意地写进了《西域考古记》一书中^[4]。另一英国人卡布别尔 (W·Cambell) 于 1902 年曾到过克什克腾旗元应昌路遗址，进行所谓的“考察”活动。

美国人拉铁摩尔 (O·Lattimore) 在 1933 年作横断中亚的旅行时，来到了今达茂联合旗鄂伦斯木元德宁路遗址，辨识出古城中有十字纹的墓石是景教寺院遗迹，著有《内蒙古的一座景教城市遗址》^[5]一文。1936 年海涅士 (Haenisch) 和马丁 (D·Mortin) 根据拉铁摩尔提供的线索，在鄂伦斯木及其附近调查，又找到了一批景教徒墓石和古城址，著有《关于归化

城北的景教遗迹的初步调查报告》^[6]。还在王墓梁发现了汉文铭刻的“管领诸路也里可温（景教徒）”耶律于成的神道碑^[7]。

早在清康熙年间，法国耶稣会士张诚（Gerbillon）即来到中国，1689年中国与俄罗斯缔结《尼布楚条约》时，康熙帝命张诚作为中国代表的译员。他在随行日记中就曾记载考察克什克腾旗元应昌路遗址的情况，著文刊载于法文《中华帝国全志》上。法国天主教神父闵宣化（Jos Mullie 牟里）在巴林旗境内传教时，广泛调查了这一带的辽代遗迹，于1920年编著了《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8]一书；他得知辽庆陵被掘消息后，便去庆陵进行调查，将此消息发表在《通报》上。1922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梅岭蕊（Louis Maric Kervyn）挖开了庆陵的中陵，找到了兴宗和仁懿皇后的汉文和契丹小字哀册，将契丹小字抄录发表在北京出版的《天主教会公报》上，从而引起了世界上东洋学者们的极大兴趣，至今这两方哀册仍下落不明。1923年法国天主教神父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和桑志华（Licenl）在乌审旗萨拉乌素河畔发现了河套人化石及一批古脊椎动物化石，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境内发现的3处旧石器地点之一；后来他俩又在林西教区活动中，发现了锅撑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并考察了扎赉诺尔的中石器时代文化。

日本人在内蒙古境内的考古活动更为频繁。早在1908年，桑原鹭藏就曾考察过克什克腾旗元应昌路遗址和正蓝旗元上都遗址，发表在《考古游记》一书中。鸟居龙藏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来到我国东北及内蒙古一带活动，曾多次深入到赤峰市和哲里木盟地方。著有《蒙古纪行》、《满蒙古迹记》、《辽之文化》、《辽文化再探》等书。辽庆陵被掘后，鸟居龙藏曾前往调查，并于1931年著文在《国华》杂志上发表。同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织内蒙古调查团到庆陵调查，团员有江上波夫、田村实造等人。1933年鸟居龙藏再次到辽庆州和庆陵调查。1934年关野贞到庆陵调查。1935年日满文化协会派黑田源次、竹岛卓一等调查庆陵，著有《林东古迹踏查记》一书。1939年东亚考古学会又派田村实造、小林行雄等人到庆陵，掘开墓室进行测绘、摄影，并临摹了壁画。1953年日本出版了田村实造等编著的《庆陵——关于东蒙古辽代帝王陵墓的研究报告》两卷本。1935年由东亚考古学会组织滨田耕作、赤崛英三、岛田彦贞、三上次男、三宅宗悦、水野清一等发掘了赤峰红山遗址及墓葬，刊印了《赤峰红山后》一书，红山文化由此得名。1936年，江上波夫、赤崛英三等人组成的调查班，在内蒙古东部至中部的大青山前后，广泛进行考古调查，涉及遗址包括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巴林右旗白塔子辽庆州遗址、正蓝旗元上都遗址、达茂联合旗阿伦斯木古城等处，出版有《蒙古高原横断记》一书。1939年，江上波夫、阪田须贺斯等再次调查了鄂伦斯木古城，1942年江上波夫又考察了鄂伦斯木古城。江上波夫曾著有《汪古部的景教系统及其墓石》、《发现百灵庙鄂伦苏木元代汪古部王府遗址的调查》等一系列文章^[9]，还与水野清一合作，将历年在内蒙古及我国北方收集的青铜器，编著了《内蒙古长城地带》一书。1933年至1938年间，远藤隆次、德永重康、赤崛英三、加纳金三郎等人，曾多次调查扎赉诺尔中石器时代文化^[10]。1944年岛田正郎等人发掘了巴林左旗辽祖州城遗址，1955年出版了《祖州城》一书。1939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织原田淑人等调查了正蓝旗元上都遗址，出版了《上都——蒙古多伦诺尔元代都城址调查》一书。1944年小山富士夫等人发掘了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内的白瓷窑址，并调查了赤峰缸瓦窑、巴林左旗白音戈勒窑址等。

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自1890年起，在我国新疆、西藏境内多次进行探险活动。1926年冬，他再次来华，希望作一次横贯中国内陆的考察活动，但遭到了北京学术界一致反对，经过6个月的谈判后，终于与中方达成协议，中瑞双方共同组成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

团。1927年5月,考察团在瑞方团长斯文赫定、中方团长徐炳昶率领下,自北京启程,经内蒙古包头、达茂旗、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等地进入新疆。团员、瑞典人贝格曼(Folke Bergman)等,在额济纳河流域发现了汉代居延边塞遗迹,发掘了若干汉代烽燧和障址,获得大批汉简,并广泛调查这一带地区的西夏至元代遗迹和墓葬,著有《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蒙新探险日记》等书。斯文赫定等人的考察活动一直延续到1935年。斯文赫定主持编撰出版的《中瑞科学报告》多达55卷,其中斯文赫定的日记《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书,记载了他在内蒙古、新疆的科学考察活动情况。

2. 现代我国学者在内蒙古的考古活动

外国人在我国境内的所谓探险活动中,肆意破坏和掠夺祖国文化宝藏。其行径激起了我国人民群众的愤慨,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纷纷提出批评和抗议,有的爱国学者便投身于田野考古,以实际行动保卫祖国的尊严和珍贵文化宝藏。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率团考察时,将工作情况写成日记,出版了《徐旭生西游日记》一书,其中有些章节就记载了内蒙古的考察情况。该团团员黄文弼1927年6月在内蒙古达茂联合旗找到了元代汪古部主世代居住的赵王城,即今鄂伦苏木古城,在城内发现了《王傅德风堂碑记》石碑。他将这项重要发现在《燕京学报》上报导后,立即引起海内外的广泛注意。同年9月黄文弼到达额济纳旗黑城,在城内及附近一带进行考察,并沿河上溯到甘肃毛目附近,考察了额济纳河两岸的汉代居延边塞、烽燧和城障等遗迹。

1930年,考古学者梁思永来到内蒙古调查,在赤峰、林西及阿鲁科尔沁等地采集了一批新石器时代遗物,著有《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11]一文,这是我国学者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的开端。

抗日战争时期,佟柱臣曾任教于赤峰中学,经常到市郊进行考古调查。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以专业考古工作者的身份,再到赤峰市郊一带进行系列考古调查,发现了若干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以至秦汉时代的遗迹。建国以后发表的《赤峰东八家石城址勘查记》、《考古学上汉代及汉代以前的东北疆域》^[12]等文章,都是他在内蒙古工作期间积累的考古资料。

抗日战争时期,李文信曾在内蒙古巴林左旗进行过考古工作,积累了不少资料,建国以后发表的《林东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瓷窑址》^[13]一文,便是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其它资料散见于《辽瓷简述》^[14]等文章内,为研究内蒙古以及东北地区辽代文物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考古学者裴文中曾到内蒙古扎赉诺尔调查中石器时代的扎赉诺尔人及其文化遗物;他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15]一书中,力主扎赉诺尔人及其文化为中石器时代,否定其为旧石器时代文化,颇有说服力。

辽庆陵石雕哀册文出土后,国内学者纷纷对其中的契丹小字进行研究,主要有厉鼎焯、罗福成、王静如、谢国桢等等^[16]。金毓黻将所有存世的庆陵出土的哀册铭文拓本汇集在一起,编成《辽陵石刻集录》一书,奉天图书馆于1933年刊印。书中有罗福成对译的契丹小字译文。

3. 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的肇创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党和政府重视保护文物,内蒙古的文物考古事业从零开始,逐步向前开拓前进。文物考古工作是一项严肃的科学工作,不同于近代考古学,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运用实物资料探讨考古学的课题。内蒙古的考古工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逐步开展文物保护、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多年里,创建了内蒙古的文物考古事业。肇创期内又可分为启蒙和初创两个小阶段,分别表现在组织建设和业务发展两个方面。

1954年蒙绥合并前，内蒙古自治区和绥远省的文化行政部门，已配备有5名文物干部。1954年春，正式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组，负责全区的文物保护管理、田野调查和清理工作，是一个属于半行政半业务性质的工作机构。肇创初期的5名文物干部，都是先后经过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合办的考古训练班培训结业；他们在各级党政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在各地方文化部门的热忱帮助和支援下，陆续在全区境内开展考古调查和小规模清理发掘工作，初步掌握了全区重要文物的分布状况，逐渐认识出一些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和发展规律，但此时还处于认识事物发展规律的阶段，因此称为启蒙阶段。

自1958年开始，内蒙古的文物考古工作有了一定的发展，陆续增设了几个文物考古工作单位，增添了一批业务人员，并开始配合生产建设开展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内蒙古文物工作组自1958年后人员成倍增加，其中包括了一批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1960年时，业务人员多达24人。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于1959~1960年间曾建立文物处，负责全区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内蒙古文物工作组自1961年6月起正式改称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从半行政半业务性质正式过渡到事业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文物处撤销后，全区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仍由社会文化处负责，但文物工作队仍起着参谋作用，有关这方面的文件基本由文物工作队草拟，以文化局名义上报下达。1955年，由内蒙古文物工作组建议筹建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同年开始调集筹建人员，1956年动工兴建，1957年5月1日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时正式开馆；自1961年起馆内增加了考古人员，专门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1959年，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分院建立了考古研究所，1960年至1961年初与内蒙古文物工作组合署办公。1961年撤销了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分院，考古研究所合并到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并改名为考古组。内蒙古大学历史系在1958年至1962年间，曾一度设立考古研究室，教研室的教师曾在呼市郊区及黄河沿岸进行过考古调查，并派教师支援内蒙古文物工作组（队）的大规模考古发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自1958年起开展在内蒙古的考古工作，先是派员调查拟建的万家寨水库淹没区的黄河沿岸的古代文化遗迹，1959年派员支援内蒙古文物工作组发掘辽中京遗址，1960年正式建立了内蒙古工作队，先后在赤峰、宁城、巴林左旗和满洲里市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发掘。自治区还组建了两个盟一级的文物工作站，昭乌达盟（今赤峰市）文物工作站始建于1958年，自1959年起在昭盟境内广泛调查，曾清理过敖汉旗石羊石虎山古墓等；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始建于1958年，曾配合内蒙古文物工作组清理发掘过元代集宁路遗址。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自1958年起陆续举办了几届全区文物训练班，各盟市及一些重点文物旗、县都派员参加学习，其中一些业务人员已成为专职文物干部。在这段时期内，内蒙古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呈现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虽然业务人员大都是新手，还需要一段适应和熟悉的过程。正当这些业务骨干人员参加了一些重大考古活动、开始向某些学术领域深入探讨，或对某些考古学文化有了一定的理论认识的时候，“文革”政治风暴席卷了中华大地，文物考古事业被迫中断。因此，这段时期仍属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的初创阶段。

内蒙古文物考古的肇创时期，自治区内外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境内的工作，取得了许多考古资料，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认可。工作方式上可分为调查、清理、配合生产建设发掘和科研课题的发掘等四种。在全区开展的文物调查，包括复查一些建国以前国内外人员调查或发掘过的遗迹，组成人员较多且完全普查过一片和一线的有：1957年巴林左旗乌尔吉木伦河沿岸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63年额济纳河下游地带汉代至元代遗址，1963年呼伦贝尔草原地区文物普查。在文物考古调查中有许多重要发现，都是超越前人的成就，如：1952年和1956年两次调查察右后旗二兰虎沟墓地，征集到的一批文物后来确定为鲜卑文